

民族史译文集

一九八四年



民族史译文集
第12册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10121200

民族史译文集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
一九八四年

目 录

- 建州女直的迁移问题……………〔日〕河内良弘著（1）
邢玉林译
- 肃慎考……………〔日〕池内宏著（39）
杨保隆 古清尧译 刘凤翥校
- 挹娄、勿吉、靺鞨的社会制度及其与
邻族的关系……………〔苏〕E. И. 捷列维扬科著（60）
冯继钦译 蔡曼华校
- 明末清初的满州氏族及其源流……………〔日〕三田村泰助著（71）
刘世哲译
- 女真音的构拟……………〔日〕清濑义三郎则府著（93）
邢复礼 刘凤翥译
刘世哲校
- 论女真文字的结构……………〔南朝鲜〕辛兑铉著（115）
黄有福 祁庆富译
-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简介……………（113）
- 第13期目录预告……………（38）

建州女直的迁移问题

[日] 河内良弘 著

邢玉林 译

目 录

| | |
|--------------------|-------|
| 一、序言 | (1) |
| 二、选择迁移的季节 | (2) |
| (一) 迁移的各例 | (2) |
| (1) 斡朵里族迁移凤州 | (2) |
| (2) 毛怜卫 浪卜儿看迁移凤州 | (3) |
| (3) 斡朵里族迁移会宁 | (6) |
| (4) 建州卫迁移婆猪江 | (7) |
| (5) 建州卫迁移吾弥府 | (9) |
| (6) 李将家迁移吾弥府 | (9) |
| (7) 建州卫迁移苏子河 | (11) |
| (8) 凡察迁移东良北 | (11) |
| (9) 童仓、童凡察迁移苏子河 | (13) |
| (二) 本章结论 | (13) |
| 三、迁移的季节和自然障碍 | (15) |
| 四、建州女直的主要经济 | (18) |
| (一) 建州卫的农业 | (18) |
| (1) 牛的问题 | (20) |
| (2) 朝鲜军骚扰农作问题 | (22) |
| (二) 斡朵里族的农业 | (23) |
| 五、发生饥馑的时期和陈请粮食期间 | (25) |
| (一) 斡朵里族 庆源之役后的呈请 | (26) |
| (二) 兀良哈族 迁移凤州后的呈请 | (26) |
| (三) 斡朵里族 迁移会宁后的呈请 | (27) |
| (四) 建州卫 迁移婆猪江后的呈请 | (29) |
| (五) 建州卫 世宗十五年役后的呈请 | (30) |
| (六) 本章结论 | (32) |
| 六、结语 | (33) |

一、序 言

本文以永乐八年至正统五年作为明代初期。在这三十年间，建州卫、建州左卫等建州女直累次进行大规模的迁移。例如，就斡朵里而言，永乐九年从朝鲜东北境豆满江上游的会宁迁往辽东的凤州（山城子）；永乐二十一年从凤州迁往会宁；正统五年从会宁迁往辽东。同时，迁移的距离一次有达三百至五百公里者。可见迁移次数之频、规模之大。

关于建州女直的迁移，前辈学者如池内宏博士、和田清博士、园田一龟博士等都作过详尽而缜密的研究^①。他们全面地论述了迁移的时间、地点及经过，本文无须赘述。不过，笔者在这些先辈研究成果的启发下，在阅读《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的过程中有一疑问值得提出：为什么建州女直常常在三、四月迁移？下为建州女直及其有关部族迁移时间一览表：

| | | | |
|---------------------|----|----|-------|
| (1) 永乐九年 | 四月 | 出发 | 斡朵里族 |
| (2) 不明（永乐九年——永乐十四年） | | | 毛怜卫遗种 |
| (3) 永乐二十一年 | 三月 | 出发 | 斡朵里族 |
| (4) 永乐二十二年 | 四月 | 到达 | 建州卫族 |
| (5) 不明（宣德八年） | | | 建州卫族 |
| (6) 宣德十年 | 三月 | 出发 | 斡朵里族 |
| (7) 不明（正统二年） | | | 建州卫族 |
| (8) 正统五年 | 三月 | 出发 | 斡朵里族 |
| | | 到达 | |
| (9) 正统五年 | 六月 | 出发 | 斡朵里族 |

从永乐九年至正统五年约三十年间，建州女直有关集团先后迁移九次。其中，(2)、(5)、(7)三次时间不明；(1)、(3)、(4)、(6)、(8)、(9)六次时间明确。在这六次中，(1)、(3)、(4)、(6)、(8)五次迁移日期均在三、四月。(9)一次是在六月。

时间不明者，暂且不谈。时间明确的六次中有五次都在三、四月，这五次迁移仅占迁移总次数的百分之五十五，但却占时间明确的六次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迁移的时间大多在三、四月，这或许是偶然性，但实际生活中偶然性并不会多次重复出现。因而我认为，有迹象表明，建州女直三、四月的迁移时间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对女真族迁移来说，一年当中是有便于迁移的其他月份的。三、四月份居地气候寒冷、河川冰封未解，用于运输的马匹亦瘦，因而并不是人数众多的集团进行迁移的方便日期。错过五、六月的雨季，在草木茂盛的秋季作长距离迁移比三、四月更为适

宜。然而，在这时期迁移的例子一个也没有。

建州女直也没有在十二月和正月迁移的，其原因当然可以推测是积雪堵塞交通，不得不延至三、四月。但是，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三、四月仍是残雪覆盖河川、山谷的季节，此时匆忙迁移远不如俟稍暖之后迁移更为有利；况且，冬季从豆满江流域到辽东的交通并非被积雪所堵塞。建州女直人等常常选择十二月、一月等严冬季节入贡中国。也就是说，在一年的十二个月当中女真族都可以畅行无阻地进行迁移。

九次迁移中，日期明确的有三次。其中（5）和（7）两次，是因为建州女直遭到朝鲜军的突然袭击，因兵荒马乱而四散，与其说是迁移，莫如说是败走，当然谈不上计划性，更不可能有准确的日期。总之，迁移日期不明或无规律者，乃是由于迁移前没有周密的计划；与此相反，三、四月份的迁移都是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和充分准备的。

虽然各季节都可以迁移，但是毕竟还有更理想的季节。那么，是不是必须选择三、四月呢？除了积雪、寒气等自然障碍能左右迁移日期，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条件能制约迁移日期呢？这种重要的条件又是什么呢？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弄清在三、四月迁移的原由。

在回答以上几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探索建州女直各次迁移的始末根由；其次，有必要说明建州女直在三、四月份迁移决非偶然，这个日期是建州女直精心选择的。

附记

（1）这里的所谓建州女直，是指建州卫、建州左卫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毛怜卫人等。为了叙述方便，不用建州左卫称，皆用斡朵里族名。为避免和建州卫混淆，所以不涉及建州左卫建置前该族的情况。

（2）本文采用明的年号，朝鲜王年号放在括号里并列明年号下。

（3）资料来源主要是《明实录》和《李朝实录》；其次是迄今为止所发行的《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摘抄》（京都大学文学部编），以及《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摘抄》（东京大学文学部编）。

（4）从以上两本史料摘抄中引用的史料，均注明页数。例如，满一·二六二表示明实录摘抄满州篇一，第262页；李四·一〇八表示李朝实录摘抄第四册，第108页。

二、选择迁移的季节

（一）迁移的各例

（1）斡朵里族迁移凤州

由童猛哥帖木儿率领的斡朵里族，在李朝时代的第一次迁移是从当时住地会宁到明的辽东风州，时在永乐九年（太宗十一年）四月中旬。《李朝实录》记载：

太宗十一年四月丙辰。东北面吾音会童猛哥帖木儿。徙于开元路吾音会。兀良哈地名也。猛哥帖木儿。常侵庆源。畏其见伐。徙于凤州。凤州即开元。金于虚出所居。于虚出即帝三后之父也（李一·三〇九）。

吾音会也记载为阿木河、斡木河，为朝鲜咸吉道会宁之地，是丽末以来从三姓方面迁移

而来的斡朵里族的本根据地。凤州即房州、坊州、奉州。据箭内、稻叶两博士推测，其地为今辉发河边的山城子^②。于虚出，《明实录》作阿哈出，是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首领。据《明实录》，他最后来明之日是永乐七年秋七月丁丑（满一·三三九），永乐九年（太宗十一年）已不在世，其子李显忠（释家奴）任都指挥僉事，掌管建州卫，居凤州。童猛哥帖木儿是借助李显忠之力迁移的。

关于此次迁移的前后情形，池内宏博士、和田清博士均有详细地研究^③。大约在迁移的前一年即永乐八年（太宗十年）二月（庚子），北方女真、嫌真兀狄哈族的金文乃、葛多介兄弟入寇庆源，与他们交锋的朝鲜军兵马使韩兴宾在乱战中阵亡。朝鲜得到此消息，命吉州察理使赵涓讨伐兀狄哈。三月六日，赵涓率一千兵马至豆门。但他以“路遥”为由，没有攻击当前之敌嫌真兀狄哈，反而将锋芒指向与此事件完全无关的弱小的毛怜卫，并乘其不备杀害了由兀良哈族构成的毛怜卫的首长把儿逊、阿古车等。

幸存的毛怜卫人等，一方面在庆源的阿吾知攻击朝鲜军，另一方面要求斡朵里族参战复仇。正在慰抚毛怜卫人的童猛哥帖木儿被迫参战。满、鲜两军未分胜负，并且退出了战斗。童猛哥帖木儿遂率领斡朵里族离开旧居，退避别处。

和朝鲜的关系更加恶化而且不见好转之兆，使童猛哥帖木儿决心迁移。五月，毛怜卫幸存者甚至逼鲜军于南方的龙城，而朝鲜则于八月将北方的德、安二陵移至咸州。打算暂时避难的童猛哥帖木儿也在此时失去了归还旧居的机会。迫不得已和鲜军交战的斡朵里族是不可能旧居安生的。既然旧居并非安全所在，那么只有留在避难地或计划迁移别处。有关其现住地的位置，史料记载不明，大概是从会宁至凤州一线的东良北地方。据太宗十年五月丁卯记载，该地“人多地窄。生理良艰”，没有沃野容大集团立足。面对这种局面，童猛哥帖木儿决心迁移。《李朝实录》太宗十一年正月辛巳（李一·三〇六）记载：

东北面监司上言。野人来言。猛哥帖木儿。将徙于深处。恐乘其时侵掠……。

赵英茂、李天佑进言曰。今猛哥帖木儿。虽令招抚。今将移徙于开元路。恐与种类。以间道直向吉州。则镜城如囊中之物。又牧马南下。则端青之地骚然矣。

此为迁移前三个月的情报，值得注意。此称童猛哥帖木儿迁移深处的工作正在准备中，迁移的预定地点是开元路。开元路是元朝的行政区划，地域极广。所言迁移地点似乎有些空泛，但在前引的有关迁移地点的太宗十一年四月丙辰却记载：“徙于开元路……徙于凤州。凤州即开元”。据此看，童猛哥帖木儿似乎对凤州有所了解。到太宗十一年正月，他决心迁移并着手准备，几个月后开始迁移。所以，他的迁移确非冲动之举。

（2）毛怜卫 浪卜儿看迁移凤州

永乐八年（太宗十年）遭到朝鲜军毁灭性打击的毛怜卫所属的幸存者、以浪卜儿看为首的一支，在永乐九年（太宗十一年）正月到永乐十四年（太宗十六年）六月的某时期，从朝鲜东北境豆满江流域迁移到建州卫所在地凤州。有关这个问题，诸先辈没有论及，因而有必要说明。

永乐八年（太宗十年）以后，在《李朝实录》中有关毛怜卫生存者的记述一直比较混乱。其中，太宗十一年十二月丁未（李一·三一三）记载：

兀良哈甫乙看指挥。甫乙吾指挥。遣人来朝。

童猛哥帖木儿迁移凤州正是该年四月。甫乙吾之名始见于《李朝实录》太祖六年正月丁

丑（李一·七六）：

赐吾郎哈八乙速·甫里·仇里老·甫乙吾·高里多时等五人。……各綵紬绢绵布苧有差。

甫乙吾与八乙速（把儿逊）等并载，他们都是兀良哈族强者。又，《李朝实录》太宗十年二月庚子（李一·二五一）记载甫乙吾的官职是“毛怜卫指挥”，即是永乐八年（太宗十年）庆源之役后保全的毛怜卫的指挥。

和甫乙吾一同来朝的另一名是甫乙看。据《李朝实录》世宗九年二月戊子（李二·一九二）记载：

礼曹启。兀良哈指挥刘甫乙看言曰。斡朵里酋首权豆也。兀狄哈酋首邑同介也。予则为兀良哈酋首。伏望赏赐。依权豆例。赐半飞红中笠鹿皮靴斜皮套。

从之。

可见，甫乙看为刘姓，也是兀良哈族的指挥。另外，《李朝实录》世宗十七年九月丁酉记载：

礼曹启。毛怜卫都指挥刘甫乙看。特赐青绵布三匹红绵布三匹。从之。

刘甫儿看是甫乙看的通音，和甫乙看是同一人，为毛怜卫指挥。有关刘甫儿看的记载，有前引太宗十一年十二月丁未“兀良哈甫乙看指挥。甫乙吾指挥。遣人来朝”，自此至前引世宗九年二月戊子这十六年间中断，甚至在《李朝实录》中不见其名。然而，此人以浪卜儿罕之名载于《明实录》并且在朝鲜中断其记载的十六年中出现在建州卫。《明实录》永乐十四年春正月癸丑（满一·二八二）：

建州卫都指挥僉事李显忠。及毛怜卫指挥使猛哥不花等。率其部属郎卜儿罕·

札不哈等来朝。命郎卜儿罕札不哈等为指挥千户等官。赐浩命冠带袭衣钞币。

此时，由毛怜卫指挥使猛哥不花率领来朝的郎卜儿罕，必是曾在永乐九年（太宗十一年）去朝鲜的刘甫乙看，理由如次：

〔官职〕浪卜儿罕虽多次出现在《李朝实录》中，但其官职始见于世宗十七年二月丙寅（李三·九九），复见于世宗二十年正月辛卯（李三·四六二）：“毛怜卫头目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及世宗二十一年三月壬子（李四·一〇）：“毛怜卫都指挥郎不儿罕”。以上所记载的官职与前引的刘甫儿看的官职完全相同。

〔儿子〕刘甫儿看之子，见于《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年八月癸丑朔（李三·五一五）：

兀良哈都指挥刘卜儿看子仇罗等二人。来献马。

同月乙丑（李三·五一九）又有“刘甫儿看子仇难”。仇罗和仇难有重叠音，是同一人。而卜儿看、甫乙看、甫儿看则是异音同人。另，世宗十九年十月丁巳朔（李三·四三九）：

东良北住兀良哈都指挥刘甫乙看。率其子苏应哥及管下十人。来献土宜。

此又称刘甫儿看子为苏应哥。

还有称浪卜儿罕子为仇难者。《李朝实录》世祖五年八月壬申（李五·四八四）：

咸吉道都节制使杨汀敬差官吴伯昌。弛启。囚李儿罕与子仇难·仇难之子毛多哥于会宁。

接着，同月丁丑（李五·四八八）：“斩浪李儿罕·仇难·加麟应哈……于所在”。估计

甫刘儿看之子苏应哥可能是浪卜儿罕之子伊所应（伊升巨、亦升哈、伊升哥）。世宗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李四·一一九）：

都指挥同知浪甫乙看。遗子伊所应及从弟老化老等。来言。

可见，苏应哥、伊所应、伊升哥都是同人不同音。

〔住地〕 刘甫儿看的住地，在东良北（茂山）地带，此据前引世宗十九年十月丁巳朔（李三·四三九）记载：“东良北住兀良哈都指挥刘甫儿看”；浪卜儿罕的住地也在东良北地带，此据《李朝实录》鲁山君日记，三年三月己巳咸吉道体察使李思哲调查：“（会宁镇）……西指一百二十里。下东良住。都万户浪卜儿罕。族类强盛。酋长一等。”

从今《大东舆图》看，东良北地方是茂山稍东的下东地方。如果下东是下东良的简称，那么此地相当于今茂山东部七公里的珍货洞附近。

从以上官职、儿子、住地三点看，刘甫儿看和浪卜儿罕完全一致，并且都是兀良哈族有势力的酋长。据此可以判断：刘甫乙看、刘甫儿看、刘卜儿罕、刘卜儿看和浪甫乙看、浪甫儿看、浪卜儿罕、浪孛儿罕、浪卜儿哈恰恰是异姓同人。

刘甫儿看即浪卜儿罕，永乐九年十二月确实居于朝鲜东北境地方。不过，四年后即永乐十四年春正月他作为建州卫酋长李显忠之弟、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管下来朝。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他在从朝鲜东北境的本据朝明的途中，曾停留在建州卫，以猛哥不花管下的身分来朝后不久，又回到了朝鲜。然而我认为这样解释则颇为合理：从永乐九年十二月到永乐十四年正月的四年中，浪卜儿罕和兀良哈族一起，从豆满江流域迁移并汇合到建州卫居地凤州。此有史料为证。

此时期确实有从豆满江流域向建州卫迁移者。据《明实录》记载：

（1）永乐十年六月辛酉（满一·二六二）

辽东建州卫指挥金事李显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赈贷之。上谓户部臣曰。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

（2）永乐十年十一月己酉（满一·二六五）

辽东指挥同知巫凯等奏。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指挥孛速·赵歹都·刘不顾等。悉挈家就建州居住。岁侵乏食。上命发仓粟赈之。

（3）永乐十五年十二月戊申（满一·二九四）

建州卫指挥李显忠奏。颜春地面月儿速哥。愿率家属。归附居建州。从之。仍赐赉如例。

在上引记载中，（1）叙述了永乐十年六月从塔温来附建州者的情况。据和田清博士推测，塔温为今稳成的古名多温¹；池内宏博士详尽地考证了当时豆门、庆源、钟城等豆满江流域的中、下游是兀良哈族的居地²，而其附近的稳城地方大概也是兀良哈族的根据地之一。文中“远人归化。尤宜存恤”表明，稳城之地是建州卫的新附之地，一些人从该地投向建州并于此汇合。（2）中的孛速、赵歹都、刘不顾等，显然是为汇合于建州卫而迁移的，但他们的原居地不明。（3）是指从颜春地面举家向建州卫投来者。颜春即眼春，大约是波谢特湾头地³，本是骨看兀狄哈居地。骨看兀狄哈和建州女直的关系并不亲善。大概在太宗十年以后，一部分兀良哈进出该地，另一部分则向建州卫迁移。

总之，仅在永乐九年向凤州的建州卫迁移并汇合者不只斡朵里一族，还有残留的兀

良哈族或跟随斡朵里族、兀良哈族率家同迁者。前述的兀良哈族的浪卜儿罕也必是率兀良哈族迁来者之一。虽然浪卜儿罕投向建州卫的时间不明，但从（1）的记载中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必是永乐九年十二月至永乐十四年正月之间。

浪卜儿罕等率领兀良哈族投向建州卫的理由和往年斡朵里族汇合于建州卫的理由相同，即在永乐八年（太宗十年）的庆源之役中，兀良哈族深受其害，并且此役毁灭了由兀良哈族构成的毛怜卫人的主要势力，使一族四散。幸存的毛怜卫人一想起这次战役便毛骨悚然，此有以下史实为证。

庆源战役后二十年即正统五年（世宗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在此战中阵亡的毛怜卫酋长阿古车之子仇赤入朝朝鲜。《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二年七月辛酉（李四·一六三）有仇赤一段话：

臣祖父俱受万户职事。昔者边将托以招安。给杀我父。其后每欲来朝。恐被诛戮。不敢朝见者有年矣。

实际上，三十年前庆源之役的恐怖记忆驱使他们远离朝鲜。同样地，由于恐怖和为了自卫，兀良哈族的某些人在战役开始不久就决定迁移并汇合到建州卫了。

（3）斡朵里族迁移会宁

在永乐二十二年（世宗五年）三、四月之交，斡朵里族从凤州向旧居会宁迁移。此事，始见于《李朝实录》世宗五年四月乙亥（李二·六七）：

威吉道兵马都节制使驰报。今四月十四日。童猛哥帖木儿管下童家吾下等二十七名。来告庆源府云。我指挥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指挥先令我曹。率男女二百余名牛一百余头。送还旧居耕农。仍使朝京。请谷种口粮。且移境城庆源官文。我等带来矣。猛哥帖木儿则随后。率正军一千名妇人小儿共六千二百五十名。今四月晦时出来。

童家吾下等作为先遣队，于四月十四日到达会宁。值得注意的是先遣队的编制：男女二百余名，牛一百余头。平均两人有一头牛。马是否在编并无记载。牛的数量如此之多，说明这个先遣队不单单是为后续队伍开路的，而且还明显地负有重要使命（这个问题拟于后述）。据《李朝实录》世宗五年六月丙寅、同月己巳记载，先遣队队长童家吾下大概入朝朝鲜，奉童猛哥帖木儿之命为本队作设营准备并根据童猛哥帖木儿的指示请求朝鲜发给粮食和谷种。接着，同年六月二日，童猛哥帖木儿的本队率五百二十三户到达会宁^①；六月十九日，童猛哥帖木儿母、弟于沙哈和凡察以及杨木答兀等五百余户作为第三队到达会宁^②。至此，斡朵里族六千二百五十名全部迁移完毕。

斡朵里族迁移的到达日期如次：

先遣队 永乐二十一年（世宗五年）四月十四日；

本队一 永乐二十一年（世宗五年）六月二日；

本队二 永乐二十一年（世宗五年）六月十九日。

那么，何时出发的呢？本队一的出发日期，《李朝实录》世宗五年八月辛亥记载童猛哥帖木儿言（李二·七四）：

本职等。于永乐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启程。前来阿木河等处。

予定到达会宁的日期，《李朝实录》世宗五年四月乙亥童家吾下有言（李二·六七）：

猛哥帖木儿则随后率正军一千名妇女小儿共六千二百五十名。今四月晦时出

来。

后续本队一预定四月末到达。这说明，从凤州迁至会宁需要走半个月。但实际上是六月到达的，何以迟了一个月，尚属疑问。

童家吾下的先遣队无论如何也必须在本队启程的前半个月从凤州出发。他清楚地知道后续本队的预定到达日是半月后的四月末，这个预定日期可以从他的先遣队和后续部队的出发日期之差推算出来。既然童猛哥帖木儿的本队拟于三月十五日出发，那么他必须提早半个月启程，预定三月中旬左右到达。

本队二的出发日和预定到达日不明。

有迹象表明，斡朵里族人等这次迁移的日期是经过选择的。我们探讨出发日、到达日或预定到达日正是为了了解这个选择。如前引《李朝实录》世宗五年四月乙亥（李二·六七）童家吾下所言：“我指挥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这次迁移是先请求明永乐帝并得到赦许后进行的。据《李朝实录》世宗五年六月癸酉（李二·六七）记载，得此赦许的日期是永乐二十年（世宗四年）十月：

建州左卫指挥童猛哥帖木儿。移庆源府关曰。前年十月。以大明助战。入归还来时。皇帝圣旨。猛哥帖木儿所居。在达达军马路边。可于朝鲜地移居。

前年十月，即永乐二十年（世宗四年）十月，而世宗五年八月辛亥（李二·七四）作九月。大概是九月奏闻，十月赦许。

十月得到赦许的建州女直并未立即行动，至到次年三月中旬才开始迁移。这决不是因为三月中旬有某种外部压力迫使建州女直迁移。外部压力激增的日期不是三月。那么，在他们得到赦许之时至次年三月中旬这一期间是否有过迁移的打算呢？

有关此次迁移之由，有必要作简要说明。除了前引世宗五年六月癸酉记载的童猛哥帖木儿那一段话，同年同月丙子他说（李二·七〇）：

吾等居中国。近于达达。皇帝以达达扰乱。许各还其所。吾以五百余户先来。未至者亦五百余户。

说明凤州在达达军马路边，因易受其扰，故受永乐帝赦许而迁移。同年六月癸酉条中的“前年十月。以大明助战”句，指的是在永乐二十年三月开始的远征兴安岭东的蒙古时，童猛哥帖木儿始终是永乐帝的扈从^⑨。除了他，在建州卫的酋长中，例如见于《明实录》永乐二十年夏四月庚寅（满一·三一〇）、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己卯（满一·三二二）的李显忠弟猛哥不花，也是永乐帝的随从。即使有这种关系，其居地也必须充分地防御才能经得住邻近鞑靼的报复攻击。过去蒙受种种压迫和即将遭到骚扰迫使他采取自卫而迁移，这实际上是一种退避之举。

虽然多年的鞑靼压迫是斡朵里族迁移的主要原因，但是既没有证据表明在三月左右引起迁移的外压急剧增加，也看不到被鞑靼追击而仓惶逃遁的迹象。这说明，在斡朵里族得到迁移赦许和在迁移前这段时间内，他们曾挑选了认为是最适当的日期，决不是冲动的突发动。为了在四月中旬至下旬到达目的地，三月初旬至中旬则是最合适的迁移时间。

（4）建州卫迁移婆猪江

李满住率领建州卫向婆猪江迁移，时在童猛哥帖木儿迁移会宁的第二年即永乐二十二年（世宗六年）的四月。关于这次迁移，仅见于《李朝实录》。世宗六年四月辛未

(李二·一一六)：

平安道兵马都节制使。据江界兵马节制使呈驰报。今四月十七日小甫里口子对望越边兀良哈沈指挥率军人十三名。将牛马并十三头匹来说。吾等在前于建州卫奉州古城内。居住二十余年。因鞑靼军去二月十七日入侵。都司李满住。率管下指挥沈时里哈·沈者罗老·盛舍歹·童所老·盛者罗大等一千余户。到婆猪江居住。去癸卯年。蒙圣旨。许于婆猪江多回坪等处居住。今因此到接。然无口粮种子盐酱。切欲乞丐过活。其所持印信文字上送。

三月末由建州卫李满住率领的一千余户，于四月十七日到达婆猪江。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斡朵里族先遣队到达迁移地的第三天。其新迁移地为瓮村，约在今桓仁县北部的五女山（兀刺山）南麓，此园田博士已有详细地研究^⑩。

和斡朵里族的情况一样，建州卫迁移的日期为四月决非偶然。这次迁移，也是得到明朝的赦许的。得到赦许的日期，据前引癸卯年即永乐二十二年（世宗五年）所载，为永乐二十一年太宗北征之时。世宗十五年闰八月壬戌（李二·五二七）：

上又问曰。婆猪江人等。前在何处。（崔）真曰。前在忽刺温地面方州。太宗皇帝北征时。时家老·猛哥不花等。到时波豆站。奏曰。我等之居境连达达路面。数年侵伐。愿移于婆猪江。皇帝许之。徙居婆猪江。

这次北征是七月至十一月间永乐帝的阿鲁台亲征^⑪。因而，李满住得到赦许的时间是迁移的前一年即永乐二十一年（世宗五年）七月至十一月之间。和斡朵里一样，在得到赦许后并没有马上迁移；而和斡朵里不同的是，在迁移前即二月二十七日遭到了外部的突然袭击，这当然也是建州卫被迫迁移的原因。不过笔者认为这样考虑较为妥当：在得到赦许时，建州卫毕竟有了于翌年三、四月之交迁移的计划。

二月十七日鞑靼入侵。山城子距桓仁约一百五十公里，即使有些绕道也用不上两个月。大概由于此次攻击不甚激烈，所以延迟一个月，于三月末或四月初才向凤州出发。

本来，鞑靼军的入侵在数年前就开始了，这在《李朝实录》世宗六年七月乙亥（李二·一二四）和前引世宗十五年闰八月壬戌（李二·五二七）中均有记载。这次入侵，不过是前之继续。就压迫者和压迫时间而言，建州卫和斡朵里族的情形完全相同。建州卫迁移后，虽然有关凤州方面殆无人述，但肯定是受到压力的，此有世宗十年三月丁未（李二·二二五）中的记载为证：

兵曹据平安道都节制使牒呈启。婆猪江住兀良哈指挥童所乙好等。告江界兵马使云。鞑靼军马。自相攻战于凤州境上。来整军装。若向婆猪江来。则我辈难居。愿来鸭绿江边。

可见，建州卫迁移后的凤州已变成鞑靼军自相攻伐的战场。所谓“若向婆猪江来。则我辈难居。愿来鸭绿江边”，是迁移后的第四年间接地请求朝鲜保护。建州卫人仍惧怕鞑靼军，因此与其抵抗不如逃避。这也许就是永乐二十二年（世宗六年）建州卫迁移之由。

总之，建州卫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连年不断的鞑靼军的压力而不是二月十七日的鞑靼军的攻击。此次攻击的程度虽不得知，但不可轻视。不过，建州卫并没有被压倒，而是根据上一年的计划按时出发了。值得注意的是，建州卫迁移的到达日和上一年斡朵里族先遣队的到达日即四月十四日只差三天，据此可以大致推算出其出发日。也就是说，建

州卫人是根据其到达目的地的日子即四月十七日或四月中旬的某日来推算出发日的。虽然迁移的距离不等，出发日亦不尽相同，但是建州卫人必须在四月中旬到达目的地。

(5) 建州卫迁移吾弥府

宣德八年（世宗十五年）四月，遭到朝鲜军突然袭击的建州卫，撤离其本据五女山（兀刺山），迁移到北部约二十公里的吾弥府。据园田龟一研究，吾弥府当为今桓仁北三十公里左右的北古城子^⑫。这次迁移的日期不明。由于遭到朝鲜军追击，战死218名，被俘248名。在混乱中退避内地，因而迁移的日期和地点非其所能预计，并且也来不及选择和计划。由于迁移之举必须保密，所以朝鲜在很长时期内不知其所在，直到后来根据从建州卫投来的童豆里不花所言，朝鲜才有所了解。童豆里不花始来朝鲜时在宣德十年（世宗十七年）正月，建州卫已移至新本据地吾弥府。据传，宣德九年二月斡朵里族凡察在朝明途中^⑬，看望过建州卫的李满住并在其地逗留数日，以后遣人于此地农作^⑭，为迁移作准备。其农作地不是旧本据兀刺山区，而是后来迁移之地吾弥府。凡察管下耕种的是与李满住新居毗邻的土地，这些土地一直是宣德十年四月从会宁迁来的斡朵里族的生活基础。凡察到过的建州卫，大概也在吾弥府。因此，李满住迁移吾弥府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宣德九年（世宗十六年）三、四月。

(6) 李将家（斡朵里族）迁移吾弥府

永乐二十一年回到会宁的斡朵里族为到建州汇合，以宣德八年（世宗十五年）十月发生的童猛哥帖木儿的遭难为契机，开始计划迁移。这次迁移，分作两支：一支是李将家；另一支是童仓、凡察。迁移的时间各不相同，这里只述前者。

李将家一族的迁移，时在宣德十年（世宗十七年）四月初。《李朝实录》世宗十七年四月壬子（李三·一〇六）：

咸吉道监司驰报。斡朵里指挥李将家。齎敕书。与其婿凡察。诱斡朵里兀良哈。欲徙婆猪江。斡朵里等不从。李将家只率东良北接其子指挥月下及甫乙下接指挥权赤·斡朵里马多多温等。还向婆猪江。凡察则徙居上甫乙下之地。

李将家亦作李张家，复作蒋家都督，在建州女直中可与李满住、凡察并驾齐驱。其名始见于《明实录》宣德十年三月（梁氏本己巳）（满一·五三二）的记事中。正统六年十二月丁酉（满二·一〇五）、正统九年正月壬申（满二·一五〇）也有记载。又，正统六年六月癸酉中记载的李章加，大概和李将家是同一个人。李将家是建州左卫酋长童凡察和建州卫首领李满住的岳父^⑮。本来，建州卫大酋长不娶管下，《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年七月己丑（李三·五一〇）记载：

议于政府六曹曰。……大抵斡朵里酋长。不娶管下。必求婚于同类之酋长。或兀狄哈。或兀良哈。或忽刺温。

与兀狄哈、忽刺温的婚姻关系虽无确证，但从“大抵斡朵里酋长。不娶管下。必求婚于同类之酋长”可以看出，与李满住、凡察等酋长联姻的李将家一族必是建州女直的一大名门。

李将家迁移的直接动机是童猛哥帖木儿的战死和其后北方女真族的压迫。宣德八年（世宗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以童猛哥帖木儿、豆权父子遭到开原千户杨木答兀纠集嫌兀狄哈、南突兀狄哈等所谓七姓野人的袭击为发端，斡朵里族多人被杀、被捕。此后，幸存的斡朵里族人各自寻找安全之地并开始退避。期间，李将家常与凡察一起行动。

《李朝实录》世宗十六年六月乙亥（李三·四七）：

咸吉道监司金宗瑞。密封上书曰。宁北镇节制使李澄玉事目。……一·凡察畏兀狄哈。与其妻父李将家。将欲杨屋镇城西南间二十余里山间。潜隐以居。

从畏兀狄哈再袭而暂避于山间开始，他们便计划迁移到婆猪江建州卫方面。由于斡朵里族多人反对凡察迁移，所以世宗十七年四月仅李将家一族往吾弥府。在《李朝实录》世宗十九年六月戊子的记事（李三·三七二）中，童豆里不花曾这样叙述当时吾弥府建州卫情况：

右水南边则蒋家都督。率三十余户居焉。常养马十四匹。北边则李满住。率三十余户居焉。常养马十二匹。隔江相对而居。

以江相隔，北岸是李满住部落；南岸是三千余户的蒋家都督部落。蒋家都督即李将家此部落是宣德十年（世宗十七年）迁移以后形成的。

李将家迁移的日期也是三、四月之交。这个日期也是他们选择的。从朝鲜东北境往京城传送情报需十天左右，如果扣除这个日数，那么就可以知道迁移的始期，即三月末至四月初。在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促使急速迁移的紧急事态。这次迁移原因是畏惧嫌真兀狄哈的袭击，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行动。但是，在这期间，嫌真兀狄哈的压迫既不直接也不激烈，两族之间没有战斗。尽管孕育危机的紧张状态依然存在，却不足以迫使李将家急速退避。也就是说，这次迁移并不是由突然的事件引起的冲动之举。

李将家迁移前亲自赴明廷，得到了迁移婆猪江的敕许。宣德十年（世宗十七年）二月他回到本据会宁。《李朝实录》世宗十七年二月丙寅：

咸吉道兵马都节制使。抄写李满住凡察处皇帝敕书二道以送。其辞曰。敕谕建州卫都指挥李满住等。今建州左卫都督凡察等。欲率领部下大小官民人等及百户寒火等五十家。俱来尔处居住。已敕其同毛怜卫都指挥郎不儿罕等一同前来居住。特谕尔等知之。故谕。又敕谕建州左卫都督金事凡察等。尔差指挥李将家等来奏。杨木答兀引领野人来厮杀情由。朕已具悉。……兹因指挥李张家等回。特谕尔等知之。故谕。

上为咸吉道兵马都节制使从凡察处抄写的两道敕书，一是给李满住的，一是给凡察的。这两道敕书都是在斡朵里族凡察请求迁移建州卫时由明廷发布的。从末尾两句看，这两道敕书均由李将家带回。

上实录记载的日期是二月丙寅即二月二十四日。传送情报大体需要十天，李将家从北京返回会宁的时间应当在世宗十七年二月中旬以前。李将家此时确实入明廷，还有《明实录》的以下记事为证：

宣德十年三月（梁氏本己巳）升建州卫指挥同知李张家为指挥使。从都督凡察奏请也（满一·五三二）。

因李张家升指挥使是从凡察的奏请，所以此必是迁移婆猪江前李张家和凡察一起生活时的记事。然而，文中的日期是宣德十年（世宗十七年）三月己巳，并且三月仍停留于北京，这显然是与《李朝实录》记载的于二月中旬回到会宁的记事相矛盾。

《明实录》梁氏本中三月己巳的日期，大体上是宣德十年三月癸酉朔，不可能是干支的己巳日。很明显，《明实录》传本中的文字有错乱。在英宗实录京大本中，遗漏了以上记事，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摘抄满洲篇一的这部分不得不根据宫内厅图书馆本和梁

氏本增订、补证，而梁氏本有关这个部分也并非完整。

总之，尽管《明实录》记载的日期不准确，但李张家在迁移婆猪江前理解凡察之意并入明廷则是确实无疑的。如果梁氏本的己巳日期为误，那么入朝的时间就不是宣德十年二月己巳，而是宣德九年（世宗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或十月二十六日。此时，李将家得到了迁移婆猪江的敕许，途中歇在李满住处。虽然回到会宁的时间是十二月还是一月无从可考，但最晚不超过二月中旬。

童猛哥帖木儿遇难使斡朵里族极惧嫌真兀狄哈的袭击，从而四处逃散，不久便决定往建州卫迁移。如果能退至婆猪江方面，则可免受其袭。因此，也可以说被迫迁移的压力来自外部。为使迁移后的生活和政治安全均能得以保障，迁移前必须得到明廷的敕许和履行必要的手续，李将家正是为此而入朝于明的。不过，在得到敕许后并未立即迁移，这是因为他们等待三、四月之交这个时机。迁移是在完全平静的环境中进行的。由此可以判断，选择这个迁移日期是上年的既定方针。

（7）建州卫迁移苏子河

建州卫在正统二年（世宗十九年）九月七日因再次遭到朝鲜军攻击而离开吾弥府，把本据移到苏子河（浑河支流）上游^①。据园田博士考证，新迁地当在京兴老城东南一带^②。这次迁移，实际上是因遭到突然袭击的一次仓惶出逃，既无计划又无明确的目的，来不及选择迁移日期和目的地。何时把本据设于苏子河上游，则一无所知。不过到达的日期是正统三年（世宗二十年）春。

（8）凡察迁移东良北

凡察迁移东良北和童仓、凡察迁移苏子河是相联系的。为叙述方便，将前后情况一并说明。为了脱离会宁汇合到位于苏子河上游的建州卫，童仓、凡察率领斡朵里族三百余户、一千余人于正统五年（世宗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朝鲜东北境出发。可以说，被迫迁移的外部压力来自南、北两个方面。

先是，宣德八年（世宗十五年）嫌真兀狄哈杀害了童猛哥帖木儿。此后，北方女真族对斡朵里族压迫日甚。宣德十年（世宗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嫌真兀狄哈四百余人再次攻击斡朵里族，烧毁十四家，掠男女149名，牛马445头^③，斡朵里族一直不得安宁。正统二年九、十月，兀良哈族亦恐其来寇，于是，散居各地的部落开始聚居^④。另一方面，尽管斡朵里族和嫌真兀狄哈于正统二年（世宗十九年）七月达成了和议^⑤，解除了战争状态，但相互敌视依旧。兀良哈、斡朵里累遭其害，他们那种强烈的恐怖和深刻的怨恨一直延续到迁移之时^⑥。在凡察迁移的正统五年（世宗二十二年）嫌真兀狄哈更猖獗一时，以致“今年深处兀狄哈出来声息连报不已。正当多方设备。日加戒严之时也”（世宗二十二年五月丁未，李四·一二六），“当斡朵里报逃者。未尽还业。兀狄哈声息。相继不绝”（同上日，李四·一二七）。这种状态，不得不迫使斡朵里族考虑迁移。而朝鲜的态度又促使他们必须远迁。朝鲜并不理解斡朵里族计划迁移是为了躲避北方女直族的袭击，担心斡朵里族一俟迁于内地，脱离它的监视并形成一大集团将对它构成一种威胁。为了铲除使斡朵里族得以发展的一切萌芽，朝鲜以各种手段企图阻止斡朵里族向内地迁移。为此一面竭尽羈縻，一面严加监视。来自北方的压力和来自南方朝鲜的监视是斡朵里族遭受的双重压抑。朝鲜的多虑、担心和把斡朵里族迁至南方的朝鲜境内的企图，更加刺激了斡朵里族。南、北两方的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促使斡朵里族远

迁至建州卫。

斡朵里族的凡察、童仓等于正统五年（世宗二十二年）六月开始迁移。与建州女直迁移比较，日期甚迟。其所以如此，必有特殊原因，这点将在（9）中加以说明。在此次迁移前，凡察一族曾从会宁向东良北进行小规模迁移，其时间实际上是三月初。

凡察迁移至建州卫很突然，既无计划又无准备。正统二年（世宗十九年）二月，凡察向明廷提出迁往建州卫的请求并得到了敕许。然因朝鲜的阻挠而受挫。同年十一月，童仓又遣使往请，由于朝鲜的反对，明廷取消了敕许，迁移未成²²。第三次，正统四年（世宗二十一年）七月，童仓遣部下童答察儿到北京请求敕许，他在原地等待消息，整饬旅装，准备迁移。《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一年九月甲子（李四·六一）：

咸吉道都节制使金宗瑞。驰启曰。凡察移归之心已决。欲与管下五六家。治其行装。期待搭察儿之来。

大概决心迁移是在九月。可是，遣明使童搭察儿向整装待发的凡察转达：明廷不准迁移。这个消息使斡朵里族首领感到迷惑。迁移再次受挫。作为受明羁縻并在明保护下生存的建州女直擅自迁移就等于辱抗明廷，而这样则意味着灭亡。但是，不迁移也同样是危险的。北方的压迫、南方的监视依然如故，现状未见好转。在欲迁不能，欲留甚险的逆境中，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躲避危机才是第二良策。正统五年（世宗二十二年）三月，凡察举家迁往东良北。《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二年七月辛丑朔（李四·一四五）记载：

遣使曹参判崔致云。如京师。奏童仓·凡察等逃窜事由。特赐弓矢衣服。有加常例。奏曰。先据议政府状启。备咸吉道都观察使李叔時呈报该。有本道镜城居住吾都里凡察。耕农打围为由。带领妻子。于东良地面。无时擅便往来。至正统五年三月初头。挈家起移去託。

所谓东良北（茂山地方），是从会宁方面至辽东地方的一条通路。它是朝鲜军监视范围以外的偏僻之地，也是北方女真族很少入寇的地方。选择此地退避的凡察打算借此观察形势并伺机向辽东迁移。

向东良北的迁移，也是有预定计划的。先是，凡察频繁地往来于东良北方面并在此地农耕。《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二年七月己未（李四·一六一）：

传旨咸吉道都节制使金宗瑞曰。……大臣议云。凡察等。以耕农为辞。往来东良北累年矣。边将不能禁制。不得辞其责也。

又，世宗二十三年正月丙午（李四·二二三）：

遣中枢院副使金乙玄。如京师谢恩。……其奏本曰。……若凡察。初为耕农打围为由。带领家小。移住本国边陲东良地面。忽然潜隐逃去。把截官不及阻当。

可见，迁移此地的数年前，凡察“以耕农为辞”往来此地。《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二年八月己丑（李四·一八五）有凡察为农耕而往来此地的记事：

咸吉道都节制使金宗瑞。奉书承政院曰。……于前日毛多吾移去时。恐动余众。不得已。遣兵止之。今闻吾沙介·所老加茂等。率十五余户。欲逃去。辎装尽输东良北凡察旧农所。

可见，东良北之地是凡察农所，居前已被耕耘，因而迁移后能立即生产和确保收成。数年前，凡察将该地列入迁移计划之中。尽管迁移该地是他鉴于明廷不准其迁移辽东而

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它作为次良策是计划的一部分亦未可知。

(9) 童仓、童凡察迁移苏子河

凡察移居到东良北时，童仓仍在会宁。正统五年（世宗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童仓才从会宁出发，移本据于建州卫。迁移的直接原因是同年三月末由威吉道都节制使金宗瑞率领的朝鲜军对童仓部族的急袭。据《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二年四月戊寅（李四·一〇八）记载，斡朵里族人童者音波向童仓报告朝鲜军已经逼近，由是童仓急速离开会宁。威吉道都节制使金宗瑞立即追击，在阿赤郎耳地方和斡朵里族接触。童仓丢弃全部财产和马匹，只身遁入山谷。当他寻找到兀良哈族酋长都乙温的部落时，竟以破衣遮体²⁴。助童仓的都乙温说：

今童仓等逃来。谓予曰。吾等逃来时。为朝鲜所逐。牛马财产悉皆见夺。仅以身免。若追杀我辈。并不得脱。幸得不死以来。……且童仓等。虽心欲逃归李满住所居。然其势既弱。来附于我。亦畏兀狄哈虏掠。又乏资财。将至饿死²⁵。

（李四·一一三）

可见，童仓处于丧失一切，几乎饿死的境地。不用说，凡察等应留应迁，众意多岐。据《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二年六月丁亥（李四·一三七）记载的马波罗说，全部资财被夺的三十余人强烈主张迁移，而凡察却行止不决，并委各地酋长合议。凡察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没有直接受害²⁶或错过了时间。有威望的人提出了迁移时间问题，但对于被夺去一切的人们来说，选择迁移时间则是毫无意义的。少数派认为，与其留在原地坐以待毙，莫如迁移以保全自己。会议中的酋长也倾向于这种意见。多年来为迁移而心碎的凡察决意利用这一机会。他认为，如果遭到朝鲜军的袭击，那么一旦明廷询问为何擅自迁移，他就有理分辩。《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二年六月丙申（李四·一四三）：

威吉道都节制使驰报。童仓·凡察等。与管下三百余户。逃往婆猪江。这次迁移，由于鲜军入侵的不测事态打乱了预定计划，完全是压力所迫。正统五年（世宗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斡朵里族毅然决然地出发了²⁷。

(二) 本章结论

以上对九次迁移的各例，特别是对其时间、动机或原因等问题作了考察。这里再作如下概括。

关于（2）、（5）、（7），虽知其迁移的年份，但确切日期不明。其他六次，或知其出发日和到达日或知其中之一。这六次中又有五次出发日或到达日是三、四月，这就是说，建州女直的迁移大多在三、四月。这个迁移日期是上一年就选择的，迁移决不是偶然的。

从列举的九次迁移情况看，迁移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是外部的压力。北部的压力来自北方女真族或靺鞨族；南部的压力来自朝鲜。而压迫的方式则不尽相同。概言之，在外压剧烈时，迁移时间无常，或如（5）、（7）或如（9）那样；在外压轻缓之时，由于建州女直有充分时间进行选择 and 准备，所以迁移时间都在三、四月之交。根据各种迹象可以判断，建州女直把迁移日期选择在三、四月之交是有目的的。